

# 从语言学的视角看美国比较文学的演变

周小莉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20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文学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美国,直至今日美国依然引领着世界比较文学的潮流。在美国比较文学的演变进程中,语言观的转变自始至终都是促使其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研究方法等发生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它既给比较文学造成危机,同时又带来了发展契机,最终推动这一学科不断重新定位自身。

**关键词:** 美国; 比较文学; 语言观; 内部研究; 文化研究; 修辞性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 (2017) 03-0127-08

在美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有几段话高度浓缩了该学科在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因此被广为引用,笔者也将从这几段话入手,来分析使这些定义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什么,从而说明比较文学是如何化约为一个语言学问题的。

第一段话来自亨利·雷马克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sup>[1]</sup>

这段话表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研究方法是着眼于文本的内部研究,研究范围是超出一国之外的文学之间的对比,或超出一门学科之外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比。

第二段话来自伯恩海默1993年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的报告:

文学现象已不再是我们学科的惟一焦点。如今,文学被作为复杂、变幻、而且经常有矛盾的文化生产领域内的各种话语实践中的一种。这个领域向跨学科观念提出了挑战,甚至让我们相信,各学科是一种历史建

构,……比较文学系不当再把眼睛仅仅盯在高层文学话语上,应当考察造就了一个文本及其高低的整个话语语境。<sup>[2][3]</sup>

在这段话中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是文学,而是囊括了“文化生产领域内的各种话语实践”,研究方法也不再是着眼于文本的内部研究,而是着眼于文本生产过程的语境研究。第一段话中所说的那种文学与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对比已经难以为继,其原因是人们不再相信某国文学和某一学科存在本质特性,所谓特性都是人为建构物,因此研究者开始关注文本形成的语境。

第三段话来自苏源熙在2003年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的报告:

比较文学最鲜明的特点不是解读文学而是对任何可能被阅读的文本进行文学性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对文本的细查、保持抗拒和元理论意识)。<sup>[3][2]</sup>

这段话中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为任何可能被阅读的文本,研究方法是对“文本进行文学性的解读”,在这篇报告中,苏源熙还表达了对第二段话中大力推崇的语境研究的排斥,他认为语境研究使比较文学淹没在其他学科当中,失去了独立性。要想找到学科存在的依据并使其恢复独立,必须回到对对象的文学性解读中去。

**收稿日期:** 2017-02-26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解构内涵”

**作者简介:** 周小莉(1979-),女,甘肃天水人,博士,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学及西方文论研究。

促使以上转变发生的原因从表层看是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们最初坚守的文学本体研究依次被语境研究和对文本的修辞性研究所取代,“比较”的内涵也由最初的“对比”向“跨文化视野”等含义演变。但如果进一步探究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必然要追溯到语言观的转变,因为文学是语言性的存在,诸如语言符号与事物之关系、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等问题,必然推动着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发生变化,因此语言观的变化是促使美国比较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驱动力。

## 一、文学内部研究

1958年的教堂山会议被认为是美国取代法国成为世界比较文学中心的标志,在这次会议上韦勒克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成为美国学派批驳法国学派的经典文本。韦勒克的批驳集中在一点:比较文学应该立足于文学内部研究,而非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

对他来说什么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呢?就是从作品外部解释其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作家生平、社会背景、哲学思想等等,19世纪之前的学者大多都是从以上角度出发去研究文学的。这种研究方式源于自古希腊以来就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本质观,即文学是摹仿某种外部现实的工具,它摹仿的现实要么是客观真理、要么是作家情感、要么是社会历史……19世纪文学批评界的现状依然如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将文学作为次一级的真实,致使传记研究、社会背景研究、思想基础研究大行其道。

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正是建立在外部研究的基础上,他们的研究目的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原因和结果的全面阐释,从而实现了解文学真相的目的。在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促进下,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他们摹仿自然科学,假定文学是由一个个细胞构成的,致力于将所有细胞的特性和来龙去脉搞清楚。在摸清细胞来龙去脉的过程中,产生了跨国界的现象,很多作家与国外作家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阐释文学的原因和结果就不能不关注其来源与影响,而比较文学正是要处理跨国界的来源和影响问题,梵第根将这一行为比作在

不同织物上发现相同的丝线:“在那些原文的复杂的织物中,我们需得带着一种一切真正的文学史家所必要的心理学上的细腻——即心灵——去寻出思想的、感情的或艺术的种种不同的丝缕来,以便再去探讨那一些丝缕是在别处可以发现,是织在别的织物中的。”<sup>[4]</sup>

这种研究方式的实质是忽略文学形式而一味关注文学内容,它归根结底来自于语言符号从属于所指事物的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念,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而且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sup>[5]</sup>在这段话中他谈的是“文字——口语——内心经验——事物”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文字是用来记录口语的,口语是传达内心经验的,内心经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因为人类面对的客观事物相同,所以他们的内心经验也大抵相同,各民族的口语和文字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记录内心经验的工具,因此语言符号的差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别。类似的观念在柏拉图的《斐德诺篇》中也有清晰的表述,柏拉图也没有给语言符号以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而是仅仅把它当成记录思想的工具,人们研究语言的目的只是为了探究作者的思想。

这种观念在两千多年之后依然被普遍认同,语言在人们心目中“不外是一种分类命名集,即一份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名词术语表”<sup>[6]100</sup>,其作用仅仅在于指代事物、传达思想,语言自身的价值和语言符号的结构、性质、功能的研究长期被忽视。

20世纪以来,随着语言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上述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人们认识到语言是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和所指事物无关,其内部具有独立的规则和秩序,这些规则和秩序是约定俗成的,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它们构成了语言的本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言的本质。因此索绪尔将语言学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内部规则的,外部语言学则研究除此之外的领域,他“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

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  
西排除出去。”<sup>[6]43</sup>

文学研究者深受语言学的启发,他们对文学的研究也从内容转向了形式,不愿再将文学作为传达某种真理或主体感受的手段,而是将之当做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东西。很多像雅各布森这样的语言学家同时亦从事文学研究,他们开掘文本自身的系统和规则,创造了一系列极具语言学特色的文学批评术语,例如“隐喻”“转喻”“叙事语法”“叙事结构”等等。美国形成了以新批评为核心的形式主义研究传统,从艾略特、瑞恰兹到维姆萨特、韦勒克,一大批学者致力于文学形式的研究,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要进行文学内部研究的观念正是这一学术传统的自然结果。他对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划分具有索绪尔内、外部语言学划分的痕迹,并且他对文学本质的规定也是从语言层面切入的:“必须弄清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这几种语言在用法上的主要区别”<sup>[7]11</sup>,与其他两种语言相比,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ambiguities)……它是高度‘内涵的’……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sup>[7]12</sup>

在这种新的理论潮流中,法国学派的研究显得很不合时宜,因此理所当然成为被批驳的对象。韦勒克认为法国学派想解释文学现象的诉求是合理的,但却弄错了方向,他们将文学的内容作为解释文学的原因,认为只要勾勒出这些内容的流传演变过程,就能确定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来源和影响关系。这种研究方式将文学当做由一些标准件组合而成的东西,却不知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因子在不同作品中也会获得新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关于来源和影响的研究虽不能说是全无理由,但至少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在于这部作品的内在结构,如果把题材、主题、人物等因素当做构成作品的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在进入某部作品之后会被同化进该作品的结构,其意义在这部作品中才能得到准确解释。如果相似的题材、主题、人物在另一部作品中被使用,肯定不能保持原作中的意义,因为它们又被新作品的结构所同化,获得新的意义。比较文学如果抛开形式,将内容当做孤立僵死的东西来研究是不科学的,研究者应该关注作品的结构,只有掌握了作品的内部结构,才能解释材料在不同作品中产生变异的原因,而审查比

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是否合格的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学生必须在本科阶段受到过良好的文本分析训练。

因此美国学者认为着眼于作品结构的研究对跨国界的文学现象解释得更为透彻,例如叶奚密的《自然诗诗歌结构研究》一文对中国山水诗和英国自然诗进行比较,二者都以自然景物为写作对象,材料相同,但在两国作家的笔下自然景物却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其原因在于作品的结构方式:中国山水诗的基本结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是空间性的、共时性的,而英国自然诗的基本结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交流,是时间性的、历时性的<sup>[8]</sup>。

他们还认为采用这种方式对跨学科问题,即文学与艺术、哲学、宗教等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解释也更为透彻。譬如文学与绘画、音乐之间的比较,一首诗和一幅画或一首乐曲可能采用了相同的题材,但其表达效果却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承载内容的形式不同:文学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绘画以线条和色彩的方式存在,音乐以声音的方式存在。当文学家为自己的语言赋予线条和色彩的特征时,他的作品会因此而具有绘画的质感,当注重语言的声音韵律时,作品又会具有音乐的质感。

由此可见,美国学者在内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它以文本为研究对象,以跨国界的文学文本和跨学科文本之间的对比为具体研究内容,其目的是通过分析不同文本在结构上的同与异,克服法国学派的缺陷,从根本上解释文学的成因和规律。

## 二、转向外部,失去学科独立性

但这种研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每个文学文本都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否则就无法进行文本之间的比较;第二,每国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否则就不能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第三,每种学科在形式上都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否则就不能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比较。以上条件又都需要具备一个共同的前提: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因为无论是文学文本的结构稳定性,还是其他学科文本的结构稳定性,都是由语言结构的稳定性来保证的,如果语言结

构处于暧昧不清游移不定的状态,那么所有关于“同”与“异”的比较都会被颠覆。

1950年代之后,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美国语言学界除了结构主义之外,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也蓬勃兴起,它们将语言学的研究路径由语言内部结构的层面向语言交际系统和语言使用等层面拓展。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体系的不变性,旨在发掘语言内部的组合规则,通过对这些规则的掌握来抓住语言确定性的一面。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将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其代表人物韩礼德认为仅仅研究语言的内部系统是不行的,必须把语言的交际和使用这些外部因素纳入语言研究,这样才更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况。语言的形式规则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意义,必须考虑交际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交际时的语境,意义只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并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语义随语境发生变化的事实颠覆了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并使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文学内部研究面临危机,新批评和形式主义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针对它们只关注文学的内部规则和不变性,忽视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可变性。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文学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关注文本意义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去描述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在这种潮流中,如果继续坚持内部研究,并试图一劳永逸地掌握文学的意义就显得不合时宜。

埋藏在语言中的危机终于发生了,这使得刚刚从内部研究中找到立足点的美国比较文学又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首先,语境化使文本意义多元化,这使文本之间的二元对比失去价值;其次,对民族文化形成过程的揭示,使民族文化统一体的幻象被瓦解,导致诸如欧洲文化具有共同结构的传统观念被颠覆,西方先进民族与非西方落后民族之间的绝对差异也被颠覆。所谓的共性和差别都被看成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并非先天存在的,这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比失去价值,欧洲中心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次,对学科建制形成过程的揭示,使文学、哲学和宗教等学科的划分和界定也变成人为建构的产物,从而导致学科之间的二元对比失去了意义。

对比较文学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很多学者认为“该学科在西方无疑已陷入危机当中”<sup>[9]</sup>,有

些学者甚至宣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研究、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研究、传媒学、翻译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为什么这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人员和学生的青睐?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再把目光局限在文学文本内部,而是转而关注文本生成和接受的系统,善于进行语境分析,这些因素都使其更具活力。

在这种形势下,比较文学现有的学科理论已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亟需调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但是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不充分,并认为“以往那种颁布一套标准有助于建立一个学科的观念已经瓦解”<sup>[21]</sup>,因此不能在短期内找到一种经得起考验的学科定位。1993年伯恩海默向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交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手足无措之际的无奈选择,报告中他放弃建构学科理论,转而采取兼收并蓄的原则,将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并建议将“比较文学”改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与文化批判”等名称,还提出了学科转型的若干具体意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旧有研究的局限和弊端,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针对旧有研究专注于文本内部结构的局限,新的比较文学将目光转向文本外部,提倡对文本进行语境化研究,在语境中关注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建议对文本进行精确阅读的同时,“考虑到意义生产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体制的语境。”<sup>[22]</sup>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例如社会学、历史学、媒介学等等,并且能够熟练运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固守修辞、诗体韵律等形式分析传统。在此基础上,传统的跨学科研究也应该放弃区分学科之间的固有差异,转而去关注各学科之间界限的形成机制。

2. 针对旧有研究强化中心和边缘二元对立的局限,新的比较文学将目光转移到这一对立的产生过程上,并形成了一系列热点话题。热点之一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揭示被欧洲文化共性遮蔽的欧洲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差异,以及被西方文化歪曲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此类研究中,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研究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热点二是对经典和非经典的重新解读,揭示造成这种二元划分的原因,

并且提倡对经典作品进行非经典化的阅读。另外,性别研究、种族研究也成为热点,学者们关注性别和种族的文化成因,从被压抑的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出发对以上问题提出全新看法。

3. 以往比较文学学者加强语言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阅读原文,因为很多文学作品,譬如诗歌,只能在原文中分析其形式特征,即使是叙事类的作品,其文学修辞手法也只能在原文当中领会,掌握原文“应该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道工序”<sup>[10]</sup>。因此译文备受排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这也是比较文学被看做是一门精英学科的原因之一,很多学生因为达不到精通两三门外语的要求而被拒之门外。新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原文和译文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外语要求的价值不应当仅限于文学意义的分析,应当扩大它的语境,理解母语发挥的各种作用:创造主体性、建立认识论模式、想象共同结构、形成民族观念以及表达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抵制和适应。”<sup>[12]23-24</sup>因此译文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翻译可以被视为一种范式,以理解和解释不同话语传统之间的交叉这个更大的问题。应当说,比较文学的一个课题就是解释在不同文化、媒介、学科、体制的价值系统之间的翻译中丢失了什么、收获了什么。”<sup>[12]24</sup>

以上的若干变化体现出,比较文学急于克服文学内部研究带来的危机,而克服危机的主要方式就是将研究重心转向文学外部,尤其是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关注意义的生产和接受过程,将语境化作救命稻草。从表面上看这种转向取得了巨大成效,它使比较文学成为最具包容力和最能迎合当今跨学科研究潮流的领域,但是“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流通时刻的主体形式的社会生活,……这与对文本本身进行文学评价还距离很远”<sup>[11]</sup>。因此这种研究包含着巨大的危机:它使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变得暧昧不清,研究方法游移不定,研究范围大得无所不包,比较文学系可以容纳各种学科背景的教授,比较文学的研究项目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影视传媒……这种情况让人不禁去问: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如果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来自于它自身之外的学科的话,那么它将面临丧失学科独立性、并且沦为界定它的那些学科的应用领域的危险。”<sup>[12]20</sup>语境化引发的最恶劣后果是

让比较文学丧失了学科独立性,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属。

### 三、立足于语言的修辞性研究

很多人意识到伯恩海默在1993年报告中对比较文学的新定位中暗含的危机,那么怎样才能让比较文学既保持学科独立性,又重获生机呢?苏源熙在2003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报告中指出,要想保持学科独立性,就不能把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应该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确定在语言层面,要充分利用比较文学学者善于从事语言分析的长处,从语言自身的特点和机制出发,“将语言——无论原文或译文——理解为具有自身分量和阻力的东西,而非仅仅将它当作某种内容传输系统”<sup>[11]4</sup>,去挖掘意义生发的机制,这才是文学研究者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身份标识。

这种观念看似回到了1950年代学者的老路上,韦勒克所说的内部研究就是着眼于文学语言的,他指出自指性和修辞性是文学语言区别于其他学科语言的标志,因此文学研究就是要分析文学语言的内在机制。但事实上苏源熙所说的语言分析与韦勒克所说的完全不同,韦勒克对文学语言的理解源自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而苏源熙对语言的理解则来自耶鲁解构主义批评传统。

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保尔·德·曼认为语言有三种特性:语法性、逻辑性和修辞性,语法性和逻辑性代表了语言稳定的一面,保证了语言符号与指称的密切结合,但修辞性却颠覆了语言的语法和逻辑,使语言符号和指称之间永远存在偏差。他以反问为例,“有什么区别?”这句话在语法上是询问区别,但在特定语境下却表达了与字面义完全相反的意思,指说话人认为两种方式并没有区别,只是以这种方式来责怪听话人明知故问。字面义是语法和逻辑赋予语言的,言外之意却是由语言的修辞性产生的,保尔·德·曼在《阅读的寓言》中说道:“修辞从根本上将逻辑悬置起来,并展示指称反常的变化莫测的可能性。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修辞的、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尽管这样做也许有点儿与普通的习惯相去更远。”<sup>[12]11</sup>

他进一步指出修辞性并不是文学语言的特

性,而是所有语言的共性,即使是哲学语言、文学批评语言,也都具有修辞性,“文学和批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被赋予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而结果却是最不可靠的语言,人类正是按照这个最不可靠的语言来称呼和改变自己”<sup>[12]21</sup>。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有学科都不能直通现实传达真理,它们都被语言的修辞性左右,都具有言外之意和多重解释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保尔·德·曼重新理解文学性和文学研究,他认为文学性指所有语言文本的修辞性,文学研究是对任何文本进行修辞性研究。这种修辞性研究至少应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都是修辞性的,不能达到和所指的完全同一,因此研究者不要徒劳地去发掘文本的终极意义,而是应该去寻找意义的生发机制;第二,任何阅读都具有修辞性,不能达到和研究对象的完全同一,整个研究过程其实是研究者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构对象,因此修辞性的阅读和研究根本上是解构的。

苏源熙赞同保尔·德·曼对文学性和文学研究的看法,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性(即文本的修辞性),研究方式应该是对任何文本进行文学性(即修辞性)的解读。这种学科定位一方面克服了195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突破了文本具有稳定结构的陈旧观念,关注意义的生成和接受过程,另一方面也克服了伯恩海默1993年报告中的弊端,让比较文学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以此作为和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社会学研究、媒介学研究相区别的身份标识,保持了学科独立性。

这并不是说坚守文本的语言分析,就一定要放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者可以借助自己善于语言分析的长处促进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权力运作机制的分析过程中,着眼于语言的文本分析是很好的工具,它能够“通过语言学或语法模式的分析来揭示这种权力”<sup>[12]23</sup>,这是一种更内在的分析。

苏源熙在自己的研究中践行着这种理念,《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是他获得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可以看做修辞性研究的一个范例。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他将自己的写作目的表达得很清

晰:他的研究是为了和一种认为语言与现实同一的观念相比较量。对这种观念而言,“语言并不是修辞的,意义可能是含蓄的,但绝无欺骗性;说话者知道他们在表达什么,并且忠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思。”<sup>[13]</sup>他认为学界对中国美学问题的探讨,也一直受此观念束缚,很多人都确信自己描述的中国就是真实的中国。因此,他要揭示这些研究文本的修辞性,从而颠覆传统的研究理念。

在以上诸文本中,《诗经》和《诗经》的阐释文本是《中国美学问题》分析的重点,作者主要探讨了《诗经》存不存在原意的问题。他将中国的《诗经》阐释文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毛诗序》为代表的解经著作,其特征是对《诗经》进行道德性政治性的解读。第二类是以古代学者朱熹和现代学者郑振铎为代表的研究,他们强烈反对道德性的解读,认为《诗经》是创作者自然情感的流露。两种说法虽然针锋相对,但持论者都认为自己揭示了《诗经》的原意。

究竟谁揭示了《诗经》原意?苏源熙经过一番分析后得出两类文本都没有揭示出诗歌原意的结论。首先,对第一类文本来说,虽然持论者以“诗言志”的说法来支持诗歌表达作者原意的观点,但是苏源熙追溯了“诗言志”这一观念的来源《乐记》中的相关段落,将之与《诗大序》中的改良版对比,发现两个文本中的表情论有着根本的区别:《诗大序》中“情”和“言”的联系是断裂的、人为的,而《乐记》中“情”“声”“音”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前者用“言”替换后者中的“声”,这一替换打破了《乐记》中表情论的统一性,使“言”成为《诗大序》表情论中的核心因素。而“言”相对于“情”来说,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任意性的符号系统,它并不与“情”直接对应,并且由于“言”的修辞本性反而会干扰或歪曲人们对“情”的表达。只要《诗大序》的作者认为诗歌的“情”是由“言”来表达的,那么诗歌就永远都不可能直通作者的原意,同样以“言”为工具的《毛诗序》当然也不能解读出诗歌的原意;其次,对第二类文本来说,《诗经》中诗歌起源的不确定导致其表达普通人自然情感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尤其是先秦的赋诗传统使诗歌的意义同用诗的背景密切相关,“在孔子及孔子之前数不胜数的文献中——《左传》中的例证尤其普遍——诗歌从来不被允许表

达它们自身的意思”<sup>[4]</sup>，在这种情况下，探讨原意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诗歌意义是随着用诗目的的变化而变化的。

事实上不但揭示《诗经》的原意不可能，而且《诗经》的原意根本就不存在，苏源熙在探讨完《诗经》的阐释文本之后，转而去分析《诗经》，通过对诗歌言外之意的发掘，他发现《诗经》中每一首诗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都蕴含了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因此上述两类阐释者都不可能抵达诗歌的原意，更不可能通过诗歌的原意来窥见诗歌创作者的意图，他们从诗歌中解读出的其实是自己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修辞性的，《诗经》的阐释文本也是修辞性的。

苏源熙在《中国美学问题》的整个论述过程中，始终坚持对各类文本进行语言分析，具体的分析策略是颠覆字面义，发掘言外之意，也就是说从语言的语法和逻辑中释放出修辞性。在该书的结语中，苏源熙进一步阐明自己在建构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意图，他要将众多时代不同、风格各异的研究者整合在比较文学的理论平台上，这个平台就是语言。

从1950年代至今，美国比较文学经历了盛极一时、危机重重、峰回路转，研究模式也经历了文学内部研究、外部语境研究、修辞性研究几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学科构架乃至概念术语都具有明显的语言学印记。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整个时代的理论潮流所致，语言学带来的震动波及到了所有人文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都因此而有所变化，因为人们认识到了自身是语言性的存在，所以对语言性质的理解成为所有研究的前提。

其次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传统使然，1950年代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多受到了新批评的影响，而新批评所做的正是语言形式分析，他们早已认识到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是对常规逻辑话语的革命性背离”<sup>[5]</sup>。虽然之后新批评受到了其他理论的挑战，但关注形式的传统却被后来的学者们所继承，例如以保尔·德·曼、哈罗德·布鲁姆、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等人为代表的耶鲁解构学派，其研究虽然和新批评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二者对语言的关注却是一样的。保尔·德·曼在《阅读的寓言》第一章“符号学与修辞学”中谈到对形式主义和内在批评的看法，他认为关注内在形式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不能因此而斩断文本与外部因素的联系，这会让形式研究走向死胡同，因此他要找到一种打破内、外部研究截然对立的方法，使形式研究真正焕发生机。作为耶鲁大学的学生和教授，苏源熙也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美学问题》的致谢中他谈到了对该书写作起到重要作用的几个人：保尔·德·曼、雅克·德里达、孙康宜、杰弗里·哈特曼，前两位教给他的是修辞式的阅读方式，后两位教给他的是解读文本的新方法。

除了美国之外，俄罗斯、中国等不同国家的学者也在各自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语境中思考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发展方向，但美国比较文学无疑是引领世界潮流的，并且美国学者对学科的思考始终与语言观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这是切中问题实质的，因此对美国比较文学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我们认清世界比较文学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 参考文献

- [1] 亨利·雷马克.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G]//张隆溪, 主编. 比较文学译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1.
- [2] 伯恩海默. 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G]//杨乃乔, 伍晓明,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一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 Saussy H.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G]// Saussy H,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 梵第根. 比较文学论[M]. 戴望舒,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40.
- [5]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一卷[M]. 苗力田, 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49.
- [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7]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 [8] 叶奚密. 自然诗诗歌结构的比较研究[G]//李达三, 罗纲, 主编.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200-210.
- [9] Bassnett 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 1993: 9.
- [10] 马·法·基亚. 比较文学[M]. 颜保,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18.
- [11] 理查德·约翰生. 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G]//罗纲, 刘象愚, 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4.
- [12] 保尔·德·曼. 阅读的寓言[M]. 沈勇,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 [13] 苏源熙. 中国美学问题[M]. 卞东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2.
- [14] Saussy H.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1.
- [15] 兰色姆. 新批评[M]. 王腊宝, 张哲,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170.

##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ZHOU Xiao-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the cente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moved from France to the U.S., which is still leading the world tren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U.S., the change of language view has been the inner driving force for the shift of research objects, boundaries and methods. It caused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ought the opportunity for its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propelled this discipline to relocate itself constantly.

**Keywords:** 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anguage view; intrinsic study; cultural study; rhetoric

(责任编辑: 李向辉)